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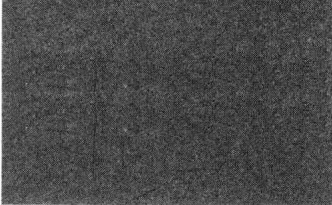
渤海史论集

BOHAISHILUNJI

梁玉多 主 编

郭素美 李东源 副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BOHAISHILUNJI

渤海史论集

梁玉多 主 编
郭素美 副主编
李东泽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渤海史论集 / 梁玉多主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 - 7 - 5034 - 4176 - 9

I. ①渤… II. ①梁… III. ①渤海(古族名) - 民族历史 - 文集 IV. ①K28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81989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 1020 1/16

印 张: 41. 75 字数: 7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BOHAISHILUNJI

前 言

近年来,渤海国史学科发展迅速,出现了一大批新成果,这些成果涉及渤海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使许多原来比较模糊的问题渐渐清晰起来,也让不少争论多年的问题有了一定的共识。为了能较为集中地反映这些新成果,我们收集了二十六篇论文,编辑成集。其中有魏国忠、刘晓东、郭素美、杨雨舒等国内外知名专家的扛鼎力作,也有一些青年才俊的探索之文。由于篇幅所限,还有许多相关专家的好文章没能收入,本文集只能部分地反映渤海史研究的新动态。

由于地域的关系,朝鲜、韩国、俄罗斯和日本也有学者研究渤海国史,近年来,他们也有一些新成果出现。我们选择翻译了二十五篇,附于文集之后,供我国学者研究时作参考。当然,他们的有些观点我们并不赞成。

编 者

2013年6月10日

的根本区别。凯恩斯不把失业、生产过剩危机看作偶然的现象这一点上是接受了马克思的观点的，否定了以往资产阶级经济学把失业、危机看作只不过是一种偶然现象的观点。但是在关于失业、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上则是与马克思的理论截然对立的，二者是不能兼容的。可以兼容的只能是为暂时摆脱危机的一些具体手段和方法。如果把凯恩斯对危机原因的理论分析包容在政治经济学作为基本理论，用心理因素解释危机，那就是把马克思融入了凯恩斯，谈不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更谈不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和发展，否则就会失去它对推动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指导作用，但必须把握正确的方向，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实际问题与实践经验的理论思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而不是着眼于从西方经济学中捡拾“科学因素”。

本着上述精神，本选集包含的内容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指导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方面的问题。有的人机械片面地理解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一规律，只看到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而忽视这一规律中包含的另一方面的内容，即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甚至认为生产力是可以离开生产关系独立发展的，生产关系只是处于它对立的方面起被动的反作用。他们想从生产力内部矛盾来寻找它发展的内在动力。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向是错误的。这实际上是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看做是两个可以分割开来的观点，应当看到它们是物质生产中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一个是物质实体，一个是它的社会形式。正是由于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的动力，二者的矛盾运动决定着物质生产和社会的发展。确认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才能确认把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经世济民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次，是直接论述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未能正确总结过去在经济工作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西方经济学大量涌入的影响，无论从“左”的方面或右的方面都在攻击把社会生产关系列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缺陷，细数其弊端。他们忘记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就是由其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而确立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正

是由于深刻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揭示了其运动规律，从而使这一理论成为推动资本主义国民财富快速增长的巨大思想因素。马克思继承了古典学派这一科学成就，在更深层的关系上更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部经济结构及其运动规律，不仅肯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同时又克服了它的阶级局限性，进一步论证了资本主义关系在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逐渐使自己变旧，开始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而证明它必然被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的规律性。既然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者，那么政治经济学卫护把它作为研究对象，显然将成为直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一门科学。

一门科学的存在是由它的研究对象决定的，否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等于取消政治经济学。这必然会对正确组织我国的经济的科学发展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

第三，本书的论文还对包括股份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以及怎样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正确阐释我国提出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分配原则等问题作了深入的阐述。此外，还有经济危机、公共产品、经济学国际化等。这些同样都是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西方经济学的错误理论划清界限。不在这样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辨明是非，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指导地位就会大打折扣。

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领导再次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钟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我们应当在这方面努力。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方法，在它的指导下，才有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可是也应看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只是在它被运用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结构和运动规律，从而确定了人类社会发展是一种自然史过程后，它才不再是假设，而是经过科学检验的理论。这集中体现在《资本论》这部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著作中，正如列宁所说的，“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

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①同时也正因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运动规律，如剩余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等，最后完成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如恩格斯所说，“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②《资本论》使得那些依据人性、人道主义来塑造理想社会，把共产主义看做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失去了最后的基础。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不仅影响政治经济学界，也影响到哲学界。

我觉得为了划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界限，落实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和中国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抓好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理论灌输，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功。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认真学习原著，是确实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基本途径，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核心地位有着重要意义。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里划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界限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耐心地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作出研究。我个人的理论水平和知识面还有限，希望更多的理论经济学工作者参与这项工作，我这本选集只表明我希望参加到这件工作中去。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1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8页。

目 录

前 言	(1)
“渤海”为号由来考	魏国忠(1)
论渤海主体民族的族属问题	魏国忠 郭素美(13)
渤海国号初称“靺鞨”考	魏国忠(35)
也谈“靺鞨”名称之始见	李 玲 东 青(57)
渤海“珍陵”问题的再检讨	刘晓东(63)
小议朝鲜李朝后期对渤海国史的研究	郭素美(77)
小议朝鲜对渤海国史的研究	郭素美(85)
试论渤海国在吉林的建立和发展	杨雨舒(94)
渤海农作物品种考	梁玉多(112)
渤海国的商业贸易研究	梁玉多(123)
简析渤海国的经济体制	梁玉多(139)
“振国”、“大黄汤”与“盗修龙袞”:关于渤海国若干史料的考辨	胡梧挺(145)
渤海的交通路线与交通工具考	辛 巍(156)
关于渤海国政区地理研究的几点回顾	王 昊(165)
试析渤海国的人口与疆域	董 丹(174)
渤海上京城之“东京城”名源考证新识	杨海鹏(178)
谭其骧先生与东北史地研究	王 昊(186)
辽朝渤海国遗民高姓家族与汉人渤海郡高姓家族考略	苗霖霖(197)
试析金代辽东渤海大族与金王朝的关系	宁 波(205)
略论金朝渤海国高姓家族分支及特征	苗霖霖(215)
小议辽代渤海遗民在文化上对契丹的影响	辛 巍(224)
渤海乐曲目中“大靺鞨”和“新靺鞨”相关问题辨析	勾海燕(231)

浅谈国内外史学界对渤海墓葬的调查、发掘与研究	郭素美(238)
大武艺时期的渤日交往	郭素美(245)
渤海妇女贞操观刍议	李 玲(255)
试论渤海国婚姻观的形成	王玺明(263)

附 录

渤海国家及对外交流	[日]铃木靖民著 郭素美译(269)
关于封敖撰《与渤海王大彝震书》 ...	[日]赤羽目匡由著 郭素美译(282)
新罗末期、高丽初期东北境外的黑水、铁勒、达姑诸民族同新罗、渤海的关系	[日]赤羽目匡由著 郭素美译(300)
契丹对原渤海领地的统治及东丹国的构造	[日]泽本光弘著 郭素美译(330)
渤海和古代日本	[日]酒寄雅志著 郭素美译(355)
唐代渤海与新罗的争长事件	[日]浜田耕策著 郭素美译(365)
东北亚史与渤海国	[日]三上次男著 郭素美译(378)
切尔尼雅基诺-5 渤海古墓群的古墓类型与出土遗物	[韩]郑燧培[俄]Yu. G. 尼基京著 李东源译(381)
渤海佛教雕刻的新考察	[韩]崔圣银著 李东源译(416)
渤海东京地域的高句丽文化要素	[韩]林相先著 李东源译(435)
成为渤海人的高句丽靺鞨	[韩]韩圭哲著 李东源译(451)
北韓的渤海建筑研究成果	[韩]李秉建著 李东源译(471)
渤海遗民史研究	[韩]徐炳国著 李东源译(493)
见于韩国史料的渤海国	[韩]金钟福著 李东源译(534)
渤海五京制的渊源和作用	[韩]宋基豪著 梁玉多译(549)
渤海国与新罗的国境在哪里	[韩]徐炳国著 梁玉多译(577)
渤海人为什么要把靺鞨式姓名改成中国式的	[韩]徐炳国著 梁玉多译(589)
渤海国是否对日本的文化发展给予了帮助	[韩]徐炳国著 梁玉多译(594)
渤海国灭亡时新罗是否给予了援助	[韩]徐炳国著 梁玉多译(600)

渤海国和大陆国家的外交关系如何·····	[韩]徐炳国著	梁玉多译(609)
渤海国为什么经常派使臣去日本·····	[韩]徐炳国著	梁玉多译(615)
渤海国为什么致力于同周边国家的交易 ·····	[韩]徐炳国著	梁玉多译(626)
第二渤海国是怎样的国家·····	[韩]徐炳国著	梁玉多译(632)
俄罗斯滨海地区渤海考古研究现状 ·····	[俄]亚历山大·伊夫里耶夫著	宁波译(640)
大彼得湾沿岸南部靺鞨遗址的陶器 ·····	[俄]Я. И. 比斯卡列娃著	孟昭慧译(646)

“渤海”为号由来考

魏国忠

迄今为止，关于大祚荣政权之所以改称为“渤海”的问题，中外学者们虽然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也不乏卓有见地的推论和富有价值的探究，但作为问题实质部分即唐玄宗为什么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的问题依然未能出现令人信服的诠释。本文试图在前贤已有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探赜索引，究其本末，以期获得学术意义上的突破。

2002年《欧亚学刊》第三辑上发表的马一虹的论文《从唐、日本及新罗典籍中有关的称谓看三国对渤海的认识》，是一篇承前启后、颇有新意的重要论文，可以说是逐一批驳了既有诸家之说所存在的问题，既指出了金毓黻、刘振华、藤井贞干、吉田东吾以及王承礼等人所谓的“唐人或以‘靺鞨’二字发音与‘渤海’相近”或所谓“借用与靺鞨音近的古郡名之渤海为靺鞨之雅称”之类说法的不足为据，因为至今仍旧“无法确认”靺鞨与渤海二者间读音的“亲近性”；又指出了日野开三郎、西嶋定生、沙弗库诺夫以及王承礼、赵评春等人从“地理概念方面”所进行的解读同样“没能提供足够的令人信服的依据”，特别是对所谓的“渤海国号的名源，当是因东濒大海”即濒临渤海的说法进行了具体的批驳：“目前没有史料可以确证大祚荣时期渤海势力到达过渤海湾一带。”“实际上，唐王朝招降大祚荣，是出于解决其北方来自突厥的威胁，利用渤海从后方牵制突厥这一战略目的”，故其说“赖以成立的两点依据都失去了基础”而不能成立。

同时，该文还在评析诸家之说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新见：鉴于“唐廷所封与渤海郡关系爵号均与郡望有关”，又考虑到“唐王朝绝对不希望这个新藩国与高句丽再有任何的瓜葛，而且要从人们的意识中消除它与高句丽之间任何可能的关联。于是，唐王朝想到并选中了另一个高氏即汉代以来的名门高氏及其地望——渤海。通过将大祚荣政权与此高氏一体化，

从而将实为唐之藩国的渤海视作其内属地并广告天下”，其结论则是：“唐王朝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的确与渤海高氏、与渤海郡望有关；但这只是唐王朝的一项政略，其目的在于利用渤海高氏、渤海郡望从对外宣传上切断大祚荣的政权与高句丽之间的关联。”

这确实是个相当新鲜的见解，能够从渤海郡望的角度出发去探究同一命题而给予问题的破解提供了新的思路，应该说是富有价值的探索；不过，马氏和以往推论同一命题的许多学者一样，由于忽略或回避了唐朝之所以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前提，即为什么没有按照大祚荣政权自称的‘国号’以及由此产生的‘王号’来进行册封，当然也就同样不可能对渤海国之为何称作“渤海”的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那么，为什么说“没有按照大祚荣政权自称的‘国号’以及由此产生的‘王号’来进行册封”的问题就成了唐朝之所以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的最为重要的前提呢？因为显而易见，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它们彼此之间相互表里、互为因果，如果不能对前者做出正确诠释，也就难以正确地破解后一个问题。这就是说，只有搞清楚唐王朝之不肯按照大祚荣政权自称的“国号”以及由此产生的“王号”进行册封的历史背景，才能够有的放矢、顺藤摸瓜式地破解其不得不舍此而必须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的原因，所以，它也就成为了破解“渤海”为号这一命题的关键和要害。

其实，学界早有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如已故的朝鲜著名学者朴时亨院士就在他那篇有名的论文《为了渤海史的研究》中郑重指出：“在此有必要考虑一下‘渤海’这一国名的由来。大家知道，从唐廷册封起初称之‘靺鞨’的振国（或作震国）王大祚荣为‘渤海郡王’时起，就产生了‘渤海’这一国名。渤海郡是渤海沿岸唐的一个郡名，本来与靺鞨或高句丽毫不相干。即使有关系，也不过是它位于渤海国等东北诸国或诸种族往返唐都的途中，唐朝在此设有相应的迎送机构而已。其实唐并未把这个郡割让给振国王作封土，何必以自己国内的郡名册封他为‘渤海郡王’呢？这恐怕是史无前例的。对此是否可以作如下推测：假如唐封他为‘靺鞨郡王’，振国王一定不接受；假如封他为‘高丽国王’，唐本身无法容忍。于是就破例封他为‘渤海郡王’。”^①

^① [朝] 朴时亨著、李东源译：《为了渤海史的研究》，载《渤海史译文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986年，第20~21页。

显而易见，朴院士注意到了唐朝之没有册封大祚荣为“靺鞨郡王”和不得不册封其为“渤海郡王”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即认识到了二者系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并试图从此种关系出发去破解“渤海”为号的问题；同忽略或回避这一问题的众多学者们相比，这不能不说是知多见广、见解非常。可惜他所连续使用的“推测”、“假如”之类的臆断之词完全经不住史实的检验，因为下面的内容实际上已经否定了他的这些“推测”和“假如”。

首先，必须明确大祚荣政权建立之初曾以什么作为“国号”。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已有专文《渤海国号初称“靺鞨”考》刊发于《东北史地》2006年第3期，即通过中外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交互印证的手段，证实大祚荣政权初建时的正式国号是“靺鞨”。因为篇幅所限，这里只能择要介绍其主要论点和论据如下：

第一，中外文献古籍大都将初建时的渤海政权称为“靺鞨”，不光《新唐书·渤海传》明载：大祚荣接受唐朝的册封后，“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及《新五代史·渤海条》也谓“渤海，本号靺鞨”；而且唐时的著名史书《通典》也将渤海政权记载为“靺鞨”，宋时的《玉海·外夷来朝》也称“《传》：渤海，本粟末靺鞨。……先天中，遣使拜渤海郡王，以所统为忽汗州都督，始去靺鞨号”。又朝鲜古籍《三国史记·金庾信传下》也有“靺鞨渤海”之载；而日本古籍《续日本纪·卷八》元正天皇养老四年（720）春正月丙子条的记载更将渤海政权称之为“靺鞨国”。

第二，尤其重要的是，“靺鞨”这一称号得到了考古资料的确凿证实。这就是保存至今的著名的《鸿胪井栏石刻》上面的文字，其全文是：

敕持节宣劳靺羯使
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
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

不言而喻，刻文中的“靺羯”实即“靺鞨”的另一写法，而其中所记述的崔忻头衔——“敕持节宣劳靺羯使”，无疑来自于出使之前唐廷的授予，当然也就成为证明大祚荣政权在改称“渤海”之前以“靺鞨”为号的第一手资料，堪称铁证，不容置疑。而无独有偶，1666年在日本宫城县发现的天平宝字六年十二月一日的“多贺城石碑”上也刻有“去靺鞨国界三千里”的文字。

第三，至于所谓的“震国”或“振国”之说虽然不是空穴来风，但充其量不过是“靺鞨国”这个正式国号的俗称或别称罢了；而以情理言之，“震国”与“振国”这两个称谓中又只能取其一，即只有“震国”才是当初渤海政权的俗称或别称。

其次，还要明确“靺鞨”之号首先是大祚荣政权初建之际的自称。尽管以“靺鞨”为号的问题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但某些国外学者却千方百计地对此采取否定的态度，硬说“靺鞨”之号绝非大祚荣政权的自称而不过是反映了唐朝对大祚荣政权的称呼，从而产生了所谓的“改称”、“卑称”、“他称”、“当面不称背后称”以及建国伊始就称为“渤海”等等不同的说法；又因为相关的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中并不存在当初大氏政权自称为“靺鞨”的直接证据，故如上所述的种种毫无根据的说法曾在学术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乃至连国内的一些学者也误认了“‘靺鞨’并非靺鞨人各部的自称，而是中原地区以及治史者对这个地处东北的‘夷狄’带有侮辱性的蔑称”。^①有鉴于此，笔者曾在《渤海国号初称“靺鞨”考》一文中对这些说法逐个进行了剖析和驳斥，不过，似乎并未引起国内外同行们的重视，故有必要在这里对“靺鞨”之号究竟是不是大祚荣政权初建时的自称问题作进一步的探究，而这就必须重新回顾一下从万岁通天元年（696）营州之乱后到玄宗开元初年（713）之间我国东北地区的政治格局及各势力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将唐朝与这个新兴势力之间的关系置于当时我国东北地区乃至东北亚区域的大背景下进行比较分析，才有可能对当时扑朔迷离的历史真相做出正确的判断。

众所周知，营州的契丹叛乱使唐朝元气大伤而失去了对东北地区的控制，也让大祚荣有机会率众东归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至于唐朝虽在突厥人及奚兵的配合下平定了契丹叛乱，并多方试图恢复对营州地区的统治，不过，这一努力显然落空，因为后东突厥的势力已经以“为国家讨击”契丹并迫降其余众及奚、靺鞨诸部而深入到了这一地区，并且是“兵众渐盛”，拦腰切断了唐朝通往辽东的陆道而造成“王师道绝”^②的局面。其后，突厥势力益大，所谓“地纵广万里，诸蕃悉往听命”^③，不光邻近的契丹、

① 马一虹：《从唐、日本及新罗典籍中有关的称谓看三国对渤海的认识》，《欧亚学刊》，2002年，第三辑。

② 《新唐书》，卷二一九，《渤海传》。

③ 《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上。

奚、霫、室韦诸部皆降之，就连偏远的大祚荣政权以及黑水靺鞨也不得不臣服之并接受其“吐屯”的派驻；因之，其大首领默啜一面假装与唐王朝和亲通婚，一面继续派军队南下进攻唐朝边境，神龙二年（706）十二月还大举进攻灵州鸣沙县，并“进寇原、会等州，掠陇右牧马万余匹而去”^①。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唐中宗于翌年（707）正月，“命内外官务进破突厥之策”，才有官员上书提出了“以蛮夷攻蛮夷”的“旁结诸蕃”的建议，于是而有使者在同年的夏秋之交^②到达“旧国”，是为两唐书《渤海传》所分别记载的“遣侍御史张行岌招慰”大祚荣的重要事件。

那么，张行岌的使命究竟是“旁结”，还是“招慰”呢？据相关史书的记载，在双方间的首轮接触中是唐方面首先采取主动，即“出于解决其北方来自突厥的威胁，利用渤海从后方牵制突厥这一战略目的”而派人来联络大祚荣政权的，既然如此，则其使命的实质也就只能是“旁结”，因为不言而喻，他受命当说客是代表唐朝前来争取和大祚荣政权结盟的；而摆脱突厥人的羁绊也恰恰是当时大祚荣政权的迫切要求，故双方可以说是一拍即合，祚荣欣然接受“旁结”，其证据就是立即“遣子入侍”——以当时情形分析，别说是使节张行岌等人对人家没有任何约束的力量，就是唐朝也没有强加于人的能力，所以那完全是大氏的主动和善意。因之，双方正式实现和解并达成了共同对付突厥人的默契。本来，唐朝想趁热打铁“将加册立”，即准备正式册封大氏；却因“契丹与突厥连岁寇边，使命不达”^③而未能如愿。其后，后东突厥政权逐渐走向衰落，大氏派出的使节才于景云二年（711）十一月抵唐朝贡；不过，突厥人仍以和亲为幌子暗中支持契丹与奚侵犯唐边，并导致先天元年（712）夏唐幽州部队28000人在冷陁与奚军之战中的“全军覆没”^④。正是这一重大事态迫使睿宗皇帝退位，同年八月，太子李隆基即位，是为玄宗。年轻的玄宗决心反攻突厥人，故以大氏的朝贡为契机，于先天元年（即开元元年、713年）二月，派使节“宣劳”和册封大祚荣政权。

明乎于此，也就不难理解“靺鞨”之号首先是大祚荣政权初建之际的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六·唐纪24》，神龙二年（706）十二月条。

② 魏国忠：《大祚荣“遣子”侍唐时间考》，《北方文物》，1985年第4期，第59页。

③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渤海靺鞨传》。

④ 《资治通鉴·卷二一〇·唐纪26》，先天元年（710）六月条。

自称。因为在与大氏政权的最初接触中，是为对付突厥人的南进而不得不主动派出使节“旁结”大祚荣政权的，既然如此，也就决定了张行岌等人在整个“旁结”过程中都得小心翼翼、谨慎行事，以尽可能地“讨好”和说服人家，甚至不免露出“乞求支援的可怜相”^①，故既不可能主动地寻衅于人而做出任何冒犯或触怒对方之事，更不至于硬把一个“当时含有蔑视意味的靺鞨”^②称号强加到人家的头上；更何况，由于“契丹与突厥连岁寇边”^③，双方间的陆路来往已遭到截断，当时的唐朝即便是想强加于人也完全无能为力。反之，如果大氏家族及其政权中的主体部分不是靺鞨人而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高句丽人的话，则当对方硬给自己强改族籍而且是把个“含有蔑视意味”的称号强加到头上之际，则无论如何也绝不会不为维护自己的尊严而断然拒绝“旁结”和“招慰”，那将会产生多大的政治风波和严重后果。然而，当时的大祚荣却是立即“遣子入侍”，紧接着唐朝还要对其“将加册立”，这既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大祚荣政权确实接受了唐朝的“旁结”并主动表示了臣属，又确切地证实在双方的首轮接触中并无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当然也就足以反证当时根本不存在唐朝“蔑视”大氏政权和硬改其称号的问题。至于后来崔忻出使册封之际，局面虽然发生了某些变化，但对唐朝来说，仍旧需要“旁结”大氏，这从使节崔忻出使时所带的头衔——“敕持节宣劳靺鞨使”中即已得到体现。当然也就足以反证如果大氏政权不是继续自称为“靺鞨”的话，则唐朝绝不可能让崔忻带着这个头衔前去出使。所以，如上事实确凿证实“靺鞨国”之名既是周围邻人对大氏政权的他称，更首先是大氏政权的自称，即在接受唐朝册封前一直以“靺鞨”作为正式的国号，故鸿胪刻石文字也就是大氏政权曾自称为“靺鞨”的铁证。

再次，需要弄清楚唐玄宗不肯册封大祚荣为“靺鞨王”的原因。毫无疑问，直到接受唐朝册封前，“靺鞨国”实际上已存在15年之久，也即大祚荣在“靺鞨王”的位置上已稳坐了15个年头。对此，当时的唐朝自然了解，特别是张行岌出使后就更清楚了，唯其如此，崔忻出使时才能带着

① 1979年出版的《朝鲜全史》第5册的渤海部分第二章第一节即曾指出：“通过这件事（指册封大祚荣）可以看到唐朝为了摆脱困境对以前敌对的国家转而乞求支援的可怜相。”

② 《为了渤海史的研究》，载《渤海史译文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986年，第16页。

③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渤海靺鞨传》。